

唐文治改革下的南洋公学对邹韬奋成长的影响

苗体君

(广东海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88)

摘要: 邹韬奋在南洋公学求学的7年里,正值唐文治担任校长,正是唐文治推行的一系列教学改革与独特的办学理念,才使邹韬奋从以“工程师摇篮”著称的学校里奇迹般地成长为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文化战士、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唐文治对邹韬奋成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不仅创建了近代工科大学,而且还积极倡导研习国文并造成风气,奠定了邹韬奋扎实的国学基础;积极鼓励学校创办期刊出版物,内在激励了邹韬奋树立成为新闻记者的理想;推行免缴学费的“优行生”制度,解决了邹韬奋面临的辍学危机。所以唐文治不仅是上海交通大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改革学校教育造就邹韬奋成长成才的关键人物。

关键词: 邹韬奋;唐文治;南洋公学

中图分类号: K825.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7-3853(2026)02-0151-07

Impact of Nanyang College on Zou Taofen's growth under Tang Wenzhi's reform

MIAO Tijun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 524088, China)

Abstract: During Zou Taofen's 7 years of study at Nanyang College, Tang Wenzhi served as the principal. It was Tang Wenzhi's series of teaching reforms and uniqu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hat enabled Zou Taofen to miraculously become a great patriot, outstanding cultural warrior, outstanding publisher, and journalis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from a school known as the “cradle of engineers”. The influence of Tang Wenzhi on Zou Taofen's growt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while establishing a moder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Tang Wenzhi actively advocated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reated a culture that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Zou Taofen's Chinese studies; he actively encouraged the school to launch periodicals and publications, which internally inspired Zou Taofen to set the goal of becoming a journalist in the future; he implemented a system of “excellent students” who were exempt from tuition fees, solving Zou Taofen's crisis of dropping out of school. Therefore, Tang Wenzhi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but also a key figure in reforming school education and nurturing Zou Taofen.

Keywords: Zou Taofen; Tang Wenzhi; Nanyang College

甲午战争后,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1896年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盛宣怀以“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1]序三}的理念,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1896年建校伊始,盛宣怀亲自担任学校督办(即校长),1905年3月正式奏报将南洋公学移交商部,并辞去督办职务。商部奏定校名为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派王清穆接收,并奏请杨

士琦担任监督。^{[1]359} 纵览上海交通大学130年的历史,可以说上海交通大学以“南洋”之名立,以“交通”之名兴。自1905年春南洋公学更名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到1921年8月“交通大学合组成立,学校定名‘交通大学上海学校’”^{[2]298},17年里学校几经易名,完成了由南洋公学到交通大学的飞跃发展。17年里杨士琦、王清穆、唐文治、

凌鸿勋四人先后担任学校负责人,其中唐文治任职时间长达14年,即从1907年秋至1920年冬。唐文治不仅是上海交通大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改革学校教育造就邹韬奋等知名人士的关键人物。

1912年10月,17岁的邹韬奋随父亲邹国珍赴沪,报考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附属高等小学,彼时恰逢唐文治主政该校第三个年头,学校虽已更名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但当时的人们依然习惯称其为南洋公学。邹国珍让儿子报考这所学校,目的是希望儿子未来能成为一名工程师。而邹韬奋却在这所以“工程师摇篮”著称的学校里对文史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后来竟奇迹般地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文化战士、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而造就这一奇迹的正是唐文治在学校推行的一系列教学改革与独特的办学理念。

一、创建近代工科大学,倡导研习国文,造一种风气

1865年12月3日,唐文治出生在江苏太仓,其父唐若钦是候选教谕,一生以教书为业。唐文治自幼在父母教育下苦读经书,17岁时追随太仓理学名家王紫翔。王紫翔告诫唐文治:“文章一道,人品学问皆在其中。……汝学作文,先从立品始,不患不为天下第一等人,亦不患不为天下第一等文。”^{[2]256-257}这也对后来他执掌南洋公学产生了重大影响。1883年,18岁的唐文治考中举人,1885—1888年间受业于东南经学大师黄元同、王先谦门下。其间他博览群籍,特别对经学、小学钻研较深。1892年,27岁的唐文治考中进士,并在户部江西司任主事,随后便开始了其十多年的仕途生涯。仕宦期间他并没有放弃对经学的研究,而是拜翁同龢、沈曾植等名家为师。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他上书《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提出挽救危局之策,为京中士大夫叹赏。1898年6月,他任总理衙门章京,这期间为了解世界、熟悉业务,他“阅各国条约事务各书,并评点万国公法,及曾惠敏、黎纯斋诸家文集,自是于经济之学粗得门径”^{[2]257}。闲暇时间,他开始学习俄文,因用眼过度,伤及目力。1901年清政府与各国议和,唐文治随户部侍郎那桐出使日本。后总理衙

门改为外务部,他负责管理通商、关税等事务,他坚决抵制葡萄牙将澳门附近岛屿划入其租界范围的无理要求。1902年5月,英皇举行加冕礼,他以参赞衔前往伦敦道贺,历时半年。这期间他除了访问英国,还顺访了比、法、德、美、日诸国。两次出国经历,使他注意到了欧美诸国的富强之道。1903年8月,清廷设立商部,唐文治调任商部,后升任商部左侍郎,主持全国铁路各项事宜。1906年9月,商部改农工商部,唐文治署理农工商部尚书,同年12月回籍丁母忧。1907年9月,应邮传部尚书陈璧之邀,他就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即校长),后学校更名,称谓也随官方定名调整。离开官场的唐文治与其父唐若钦一样,余生以教书育人为业。

唐文治担任校长期间,学校赢得了“三好”的名声。所谓“三好”,即“科学好、中学好、体育好”^{[3]91}。当然,作为一所卓有成效的工科大学,首先就是“科学好”,为此,他结合自身游历欧美诸国看到的富强之道,大胆借鉴国外兴办理工科高等教育的经验,结合国家对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开办了铁路、电机、土木、航海工程专业。为了办好这些专业,他强调学生只有学好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课程,工程技术知识才容易学得深、学得透。自学校设置铁路专科开始,数学、物理课程学时就占总学时的22.7%,后来学校改革课程设置增开了许多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但数学、物理的课时数仍占总学时的19%以上。这也为学生毕业后从事专业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教学上,唐文治摒弃空谈理论,重视实验实习为主的教学实践课,把添置实验设备、建造实习工厂,视为造就求真务实人才的重要措施之一。1909年1月,他呈文邮传部称:“讲求实业,不能不资试验;欲资实验,不能不建工场。嗣后学堂如果发达,则路、轮、电三科必须设立机器工厂。”^{[4]118}在他的努力下,学校相继建成了电机厂、金工厂、木工厂等,以供学生实验、实习之用。与此同时,他还选派学生赴厂矿进行实习,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学生动手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学生毕业后也深受用人单位欢迎。

一般来说,理工科学校的学生主要时间和精力都会用在学习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知识上,至于中文,只要会写报告和公文就行了。但唐文治办学

时,则倡导“中学好”。“中学好”指的是在学校极力倡导国学教育,培育校内浓厚的人文风气,培植学生扎实的国文根基。作为国学大师的唐文治主张学校教育要中西并重,工文并进。在不遗余力引进西方科学教育的同时,他还把国文视为国民之精神,他说:“国货者国民之命脉也,国文者国民之精神也;国货滞则命脉塞,国文蔽则精神亡;爱国者既爱国货,先当维持国文。”^{[2]113}他重视国文教育的用意是“一方面以此为载体进行道德教育,另一方面努力运用本国语言文字来表述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引导科学教育走上本土化发展的方向”。^{[2]280}为此,他在学校“积极提倡研究国文,造成风气”。^{[5]136}正是由于他的重视,1908年学校设立了国文科,聘请学养高深的李颂韩为国文科科长。国文科不招收学生,而是专门组织开展专科及中小学课内外国文教学活动,唐文治也因此开创了在中国高等工科学校中设立中文系的先例。他还聘请了一批精于国学的人员来校任教,包括李颂韩、许国英、黄世祚、黄宗干、王焘曾、朱文熊、邹登泰、汤存德、吴汉声等,他们大都以扎实的国学功底获得过科举功名,而“蹩脚的国文教员便不敢滥竽其间”。^{[5]137}

除了把国文定为一门主科,他还规定每个星期天上午学校要组织课外国文教学,学生自愿参加,分为甲、乙两班。他亲自给甲班的同学授课,乙班由国文科科长李颂韩授课。李主讲《国策》等,唐文治则主讲四书五经,尤以《孟子》《易经》为多,多年如一日,从没间断过。后来,他双目几近失明,但仍让人搀扶着上讲台,背诵经文一字不差,而且讲解精微透彻。陆定一因倾慕唐文治和学校高水平的国文教学而投考南洋公学,入学后最爱唐文治周末讲授国文,盛赞听唐校长讲国文课“三月不知肉味,也不为过也”^{[2]115}。

1912年10月,邹韬奋作为插班生进入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附小四年级。当时的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的附小学制为4年,附小毕业后直接递升到附属中学;附属中学的学制是4年,附属中学毕业后直接递升至预科;预科学制为1年,完成预科后直接递升到专科;专科分土木和电机两科,学制为3年。1918年取消预科,专科学制由3年改为4年。因唐文治把数学定为小学和中学的基础课程,所以数学就显得非常重要,但邹

韬奋对数学却没有太多的兴趣。小学毕业时,他的数学考得很不好,升至中学后,他开始在数学上拼命用功,虽然大考时代数、几何成绩名列前茅,但他心里却提不起一丁点兴趣,他最感兴趣是读史论,阅读《纲鉴》。邹韬奋“每次上数学课,都感到像上断头台一样,兴趣索然,非常难受”,^{[6]18}每次写完数学作业后,他便把数学书丢在一边,并希望与它永别,然后把留出的时间用在他喜爱的文史类书籍上。

唐文治聘请高水平的国文教员到校,邹韬奋则成为最大的受益者。邹韬奋读附小时,担任他国文和历史课的是沈永癯先生,沈先生讲课“清晰有条理”“认真而又不致令人难堪”^{[5]137},还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课余参考材料,这极大地增加了邹韬奋学习文史的兴趣。中学时的国文老师朱文熊对邹韬奋的影响也很大,朱文熊是清光绪年间副贡生、清末文字改革家,也是提出“普通话”概念的第一人。朱文熊满腹经纶,讲课非常认真,邹韬奋评价他:“对学生讲解古文的时候,读一段,讲一段,读时是用着全副气力,提高嗓子,埋头苦喊,读到有精彩处,更是弄得头上的筋一条条的显露出来,面色涨红得像关老爷,全身都震动起来,无论那一个善打瞌睡的同学,也不得不肃然悚然!”^{[5]137}批改学生作文时,朱文熊“能设身处地替学生的立场和思想加以考虑,不是拿起笔来,随着自己的意思乱改一阵”。“他改你一个字,都有道理;你的文章里只要有一句有精彩的话,他都不会抹煞掉。”^{[5]138}上作文课时,朱文熊会把所批改的作文全都带到课堂上来,从第一名开始,按照顺序逐篇讲评,这对后来邹韬奋从事写作影响极大。邹韬奋还很佩服朱文熊“聚精会神,一点不肯撒烂污的认真态度”^{[5]138},认为朱文熊“实在是一个极好的国文教师”^{[5]138}。

正是由于唐文治积极提倡研究国文的风气,才使得邹韬奋对国文课有浓厚兴趣,而且还激励着邹韬奋利用课余时间阅读《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韩昌黎全集》《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全集》以及《明儒学案》等国文经典。这些书,有的已被邹韬奋读过两三遍,通过阅读邹韬奋进一步加深了对儒家思想主体的认知,同时也奠定了他扎实的国学基础。

二、鼓励创办期刊等出版物,内在激励邹韬奋树立成为新闻记者的理想

期刊杂志、纪念刊等出版物既能反映一所学校学生的风貌,又能代表一所学校的精神。1896—1905年南洋公学的译书院、师范院曾翻译、编撰出版了大量新学书籍与教科书,师范院的学生曾参与其中。1902年11月,南洋公学爆发了“墨水瓶事件”,全校200余名学生集体离校。1903年4月,这些离校学生“在校外创办《童子世界》,这是一份面向广大青少年宣传科学知识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刊物,标志着学生创办的第一份杂志正式诞生”。“1904年春,学校将历年学生的中学课业汇编成册,刊行两册四卷本《南洋公学课文汇编》,开启了学校刊印优秀学生课业的良好传统。”^{[2]239}1905年5月,南洋公学改属商部,定名为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到1913年1月,学校又改归交通部直属,改校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这段时间被称为高等实业学堂时期。这个时期学生期刊出版物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07年唐文治执掌学校后,对这一状况进行了改变。综合统计,“1906年至1921年,学校学生创办的期刊共计14种,其他诸如课业成绩、纪念册、同学录等出版物有7种”,^{[2]239}除去1921年1月唐文治离任后由南洋学会主办的《南洋学报》,唐文治掌校期间学生共创办了13种期刊,课业成绩、纪念册、同学录等其他出版物共7种。

唐文治掌校期间,学生创办的13种期刊具体是:1911年,南洋公学同学会主办的《南洋公学同学会月刊》,油印4期;1912年,周贤颂等主办的《少年杂志》;1915年3月,南洋公学同学会主办的《南洋》(季刊),发行2期,终刊时间为1915年6月;1915年6月,南洋学会主办的《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季刊),发行14期,由中华书局代印,终刊时间为1920年;1916年,无锡同学会主办的《锡秀》(半年刊),发行6期,终刊时间为1920年;1917年,壬戌级(1922级)级会甲组、乙组主办的《壬戌级刊》,甲、乙两组各发行1期;1917年,南洋学会主办的《科学杂志》,发行3期;1917年,嘉兴同学会主办的《携李》,终刊时间为1920年;1918年,南洋学会主办的《友声》(季

刊),终刊时间为1926年;1919年6月,南洋公学学生分会十人团主办的《劳动界》(二日刊),终刊时间为1919年8月;1919年,南洋公学学生分会主办的《南洋日刊》;1919年,南洋公学学生分会主办的《南洋周刊》,终刊时间为1919年底,发行15期;1920年,科学世界社主办的《科学世界》,发行3期。这些期刊大多伴着唐文治1920年离任而停办。

唐文治掌校期间,出版的课业成绩共3种(其中2种由唐文治亲自审校),具体为:1914年,土木科编辑的《旅杭测量日记》1册,铅印本;1914年,李颂韩辑录、唐文治审校的《南洋公学新国文初编》4卷4册,由苏州振新书社负责出版;1917年,李颂韩辑录、唐文治审校的《南洋公学新国文二编》8卷8册,由苏州振新书社负责出版。唐文治掌校期间,出版的纪念册有3种:1917年,南洋学会编的《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廿周图画纪念册》1册;1920年,铁路管理科毕业生编的《铁路管理科头班纪念册》1册;1921年,附属高等小学编的《附属高等小学二十周年纪念册》。唐文治执掌学校期间出版的同学录有1种,即1919年南洋学会编的《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同学录》1册。

在上述13种期刊中,只有《少年杂志》由个人创办,而且受到了校长唐文治的鼓励。《少年杂志》乃周贤颂在校就读期间(1908—1915年)创办,具体创刊年份不详。周自编自印,共发行4期,其中1期为英文版。就此周贤颂曾回忆说:“因为我在学校受了唐校长的鼓励,勇气十足,发起出版《少年杂志》。”^[7]其余12种均由学生社团创办,也都得到了唐文治的鼓励与支持。《锡秀》是学校无锡同学会会刊,1916年创刊,初名为《无锡同学会报告书》,1917年校长唐文治亲自为其定名《锡秀》,每半年刊印一期,至1920年停刊,共发行6期。该刊除了刊登无锡同学会会务活动,“对于文艺、科学尽量刊载”^{[2]241},曾于1927年、1935年两度复刊。《南洋日刊》《劳动界》创办于1919年,《南洋日刊》旨在“唤醒同胞,以扶危局”,内容“皆近于品评国家政治及社会状况,以振萎靡之民族,以尽我学生界扶助同胞之责”^{[2]242},发行时间不长。因办刊经费及学生课业原因,《劳动界》与《南洋日刊》合并,组成《南洋周

刊》,1919年7月16日出版第1期,后成为南洋大学时期学生言论最主要的阵地,直至1927年停刊。《南洋周刊》的水平较高,当时在校生黎东方后来曾评价:“提起南洋周刊,它的水准实在很高,决不是其他大学学生们所办的刊物所可比拟。这一点事实,反映了一般同学的国文程度之高,也就是唐文治先生在南洋公学及上海工专时代所奠下的基础。”^{[8]326}除学生期刊外,在学生出版物中,唐文治还亲自审校了《南洋公学新国文》一书。该书由国文教习李颂韩选录自1908年以来学校举办国文大会的菁华文章240篇,并选印校门、校舍及校长照片,所选文章“无题不新,有美必录”“理想高超,文笔奇逸,多子史气息”^{[2]242},体现了学校历年学生国文成绩的最好水平,也是唐文治长期重视国学教育所取得的成果。《南洋公学新国文》初编出版后,曾呈交通部、各学校及社会贤达鉴别,又送至美国巴拿马世博会陈列,受到了中外人士的广泛好评。学校创始人盛宣怀阅读后,亲自写信给审校者唐文治,盛赞《南洋公学新国文》:“门分类别,浓淡清奇,无美不备,直可当一部子史菁华录读,洋洋大文,叹为观止!”^{[2]243}《南洋公学新国文》备受社会各界赞誉,一时被奉为中小学学生的作文范本。而《南洋公学新国文》中竟然选了邹韬奋的7篇文章,其中一篇文章后面还附有老师对该文的评语——“文气疏宕,词义精辟。少年得此,的是隗才”^[9],足见邹韬奋的才气。

1915年1月,南洋学会成立,南洋学会内设言语、编辑、游艺三个部。同年6月,南洋学会编辑部创办了学校会刊《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简称《学生杂志》。作为校长的唐文治全力支持南洋学会创办《学生杂志》并寄予很高的期望,在创刊号序言中写道:“盖徒知文明之足以治天下,而不知甲冑戈兵之已随其后,悲夫!近代学子稍稍研求科学,徐而究其实,乃徒知物质之文明……我知中国必将有圣人者出,先以无形之竞争,趋于有形之竞争,乃复以有形之竞争,归于无形之竞争……我校诸生讲求工业,谋印杂志,公诸当世,余特发挥文明之学说以勸勉之,益将以振起我国民也。”^{[2]243-244}依据唐文治的期望,《学生杂志》在注重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应大力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他还亲自为《学生杂志》题写了刊

名。当时在附属中学就读的邹韬奋积极向《学生杂志》投稿,虽刚开始的几次总是失败,但他并不气馁,依然利用学习的缝隙继续写作。

正是在唐文治营造的这种校园氛围下,邹韬奋也开始给校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投稿。刚开始的几次也是失败的,但酷爱文学写作的他锲而不舍,连投几次后终于在《申报》上看到了自己撰写的文章,随后他到街上刻了一枚图章,到《申报》馆领取了6块大洋的稿费。此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收,很多文章陆续发表,所得的稿费不仅解决了经济上的部分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对新闻记者这个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正是在唐文治鼓励创办期刊等出版物的氛围下,年轻的邹韬奋萌生出了要去做一个新闻记者的想法。邹韬奋进入南洋公学附属中学后,开始热衷于阅读报刊文章。因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沈永癯老师家藏有全套的《新民丛报》,邹韬奋就经常在晚上跑到沈老师家里阅读《新民丛报》,并向沈老师请教写作上的问题。在阅读《新民丛报》时,邹韬奋对梁启超的文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简直着了迷一样。邹韬奋深知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和《国风报》中所建议的事情和讨论的问题已不适应时代发展,但他欣赏的是梁启超“当时的研究勤奋,笔锋锐利,眼光四射,左右逢源,每有主张,风动全国,他的那种活动力,确可算是一个新闻记者的风范”^[10]。读南洋公学附属中学二年级时,受学校重视文史研究氛围的影响,邹韬奋同寝室的一个同学对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杂志》入了迷,受该同学影响邹韬奋也开始关注《甲寅杂志》。通过阅读,邹韬奋认为,章士钊文章的“最大优点是能够心平气和地说理,文字的结构细密周详,对政敌或争论的对方采取以理服人的态度,一点没有泼妇骂街的恶习”^[11]。邹韬奋虽没有像他的同学那样对章士钊的文章过分着迷,但章的文章对邹韬奋未来成为新闻记者也有相当大的推动力与影响力。

三、推行免缴学费的“优行生”制度,解决邹韬奋的辍学危机

南洋公学初办时,免收学生的学费、膳食费,而且有月奖。究其原因乃是当时科举制还没有废除,清廷的学校教育依然是私塾教育,私塾教育向

学生传授儒家经典,学生接受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为官,所以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前,新式学校教育在中国很难招到学生。南洋公学创办之初,也只能以免收学费、膳食费及设置月奖来吸引生源。南洋公学全部办学经费来自创办人盛宣怀所管辖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金矿局等,从1896年到1905年,由盛宣怀亲自担任南洋公学督办。盛宣怀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在办学经费上尽心筹措并确保经费如期拨付。南洋公学学生不但免缴学费,而且食宿也全部由学校免费提供。曾有学生回忆当时就餐的情形:“每日三餐亦由各班依照年龄排列成行而进饭厅,每桌学生六名外,均有师范生一名伴食,须俟全体食毕,方可一同起立而散。”^{[1]288}公学的全体学生照章还一律免费在学校住宿,当时的学校将货物仓库改装成学生宿舍,据章宗祥回忆:“楼上楼下各分东西两大室,室置寝榻数十张,若邮船之三等舱。中间一室,为监宿者所居,由师范生轮值,余亦常任此职。学生寝息及起床,仿兵队式,各依定时,受监宿者之指挥。”^{[1]288-289}但到了1905年3月,盛宣怀辞去公学督办职务并将公学移交商部后,办学经费便开始出现严重问题。

唐文治担任校长期间,恰逢清末民初,国内时局动荡不安,教育也横遭摧残,导致办学经费极度匮乏。学校隶属交通实业部门时,经费来源比较稳定但并不充裕,后因学校隶属部门变更、政权更迭、经济风潮等因素的影响,学校经费供给出现过四次严重困难时期。第一次发生在1907年底、1908年初,当时唐文治刚担任校长,学校要创建工科专科,急需用款,但轮船局、电报局拖延应拨费用,为此,唐文治呈文给轮船局、电报局的上级部门邮传部,提出减去自己薪水用于办学,并请求邮传部重新筹定稳固的经费途径。此后,邮传部尚书徐世昌亲自致函唐文治,答应了唐提出的拨付请求。第二次经费困难发生在辛亥革命后直至1912年底,为历次经费危机之最。辛亥革命爆发后,唐文治顺应时代潮流,与清王朝决裂,宣布学校独立,学校也更名为南洋大学堂。而改朝换代给学校带来的经费危机,足以让学校关门。这一时期,上海其他各大、中学校也都因经费困难纷纷停课散学。唐文治不忍青年学子失学,就致信教育总长寻求帮助。此外,唐文治还采取了一系列

应急措施,包括提用南洋公学时期留存款项、对学生加收学杂费、教职员实行减薪(唐文治带头减薪50%)、多方争取社会支援等。新成立的上海军政府主动支持学校“协银一万两”^{[2]191}。在唐文治的努力下,学校“并未一日辍学”^{[2]191},困难局面延续了1年多才有所好转。第三次经费困难发生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在唐文治和全体教职员的艰难维持下,学校没有停课且渡过了难关。第四次经费困难发生在1916年夏,当时恰逢段祺瑞、黎元洪府院之争,政局不稳,存款者纷纷提款,导致交通银行停闭,本应拨给学校的经费停付,经唐文治多方求援,学校幸得勉强维持。

查阅史料,邹韬奋考进南洋公学时,恰逢学校经费供给第二次、第三次困难时期。1912年学校经费异常紧张,学校只得向各级学生征收膳宿费、学费,所以邹韬奋以插班生的身份进入附小读书时,要向学校缴纳膳宿费、学费。学校原来的收费标准是“专科、专门预科生每年收学费洋25元,中学生20元,膳宿费每年40元”^{[4]312},但邹韬奋读完一年小学升入中学后,1913年学校又规定“无论专科、中学,每名均收学膳等费洋九十九元(改章前入学者,暂照旧章收费),分两次征收。暑假年假开校时各收一半”^{[2]308},当时恰逢邹韬奋的父亲失业,邹家已无法支付邹韬奋读中学每年99块大洋的费用。就在邹韬奋面临退学风险的时候,学校为了使学生勤奋学习、恪守规章,校长唐文治制订了一个奖惩办法——凡“学生于每一学年内学业成绩列甲等,而操行较优者给以褒奖状报部奖励”^[12],并推出“优行生”制度,即“在学校里争取前三名的优良成绩,获得‘优行生’的资格,以此取得豁免学费的待遇”^{[13]62}。学期末邹韬奋就被学校评为“优行生”,享受免缴学费的优待。此后,邹韬奋在读中学的四年时间里一直是“优行生”,后升入电机专科读了两年,到1919年2月停止在南洋公学求学,他都一直保持着“优行生”的荣誉。为了获得“优行生”荣誉,他“日夜苦读,曾有两次累得咯血”^{[13]62}。正是唐文治推行的“优行生”制度,才使濒临辍学的邹韬奋“意外‘得救’”^[14],邹韬奋也因此成了唐文治“优行生”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正是靠这一制度邹韬奋在南洋公学才得以继续自己的学业。

1919年2月,邹韬奋“越来越感到所学的电

机专业和自己的兴趣不合,尤其是微积分和高等物理学,尽管最初还‘再接再厉,不肯罢休’,但最后还是被‘最艰深困难的题目’困窘得实在没有办法了,便决心和‘电机科’告别”^{[6]10-11}。随后,邹韬奋先到江苏宜兴做家庭教师,靠做家庭教师凑足学费后,同年9月他以南洋公学工科二年级学生的资格被“贵族化”^{[13]62}的圣约翰大学三年级破格录取并改学自己喜爱的文科。在圣约翰大学学习了2年,1921年7月,邹韬奋从圣约翰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结束了他的苦学生涯。1926年10月,32岁的邹韬奋接编《生活》周刊,此后便开始活跃于新闻出版行业。

综上所述,唐文治担任校长期间,把原本“专门培养行政、外交、法律等方面人才的”“政学”^{[1]25}学堂,通过改革打造成了一所著名的工科

大学,并培养出了凌鸿勋、丁西林、杨荫溥、周厚坤、支秉渊、冯简、张廷金等一大批中国早期杰出的科技人才。与此同时,唐文治还积极倡导国学,并在工科大学里培育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民主革命家、文化界大家,他们当中除了著名新闻工作者、文化斗士邹韬奋,还有无产阶级革命家陆定一、侯绍裘,文史大家朱东润,教育家孟宪承、廖世承,图书馆学家杜定友,戏剧家洪深,画家朱屺瞻等,唐文治也因此被誉为“国学大师、工科先驱”^{[3]52}的教育家。20世纪20年代南洋大学校长凌鸿勋曾评论唐文治说:“先生之于交大,有如北京大学之有蔡元培先生,和南开大学之有张伯苓先生。”^{[8]226}所以唐文治不仅是上海交通大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改革学校教育造就邹韬奋的关键人物。

参考文献:

- [1] 王宗光. 上海交通大学史:第一卷 1896—1905[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 [2] 王宗光. 上海交通大学史:第二卷 1905—1921[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 [3] 盛懿,孙萍,欧七斤. 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 [4] 《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 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卷[M].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
- [5] 韬奋基金会,上海韬奋纪念馆. 韬奋全集:7[M]. 增补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6] 亦辰.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邹韬奋[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
- [7] 周贤颂. 一个未过河的小卒子[M]. 台北:台北尔雅出版社,1981:6.
- [8] 黄昌勇,陈华新. 老交大的故事[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 [9] 韬奋基金会,上海韬奋纪念馆. 韬奋全集:1[M]. 增补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9.
- [10] 韬奋基金会,上海韬奋纪念馆. 韬奋全集:8[M]. 增补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2.
- [11] 陈挥. 中国出版家·邹韬奋[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4.
- [12] 《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 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年[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107.
- [13]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0卷[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 [14] 茅盾,等. 邹韬奋:用笔尖作战[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5.

(责任编辑:王圆圆)